

西方社会建设研究译丛

丛书主编：周晓虹 王小章

Rhetorics of Welfare
Uncertainty, Choice and Voluntary Associations

福利的措辞

不确定性、选择和志愿结社

[澳] 柯文·M.布朗 苏珊·珂尼 布雷恩·特纳 约翰·K.普林斯 著

王小章 范晓光 译

图书馆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西方社会建设研究译丛

丛书主编：周晓虹 王小章

Rhetorics of Welfare
Uncertainty, Choice and Voluntary Associations

福利的措辞

不确定性、选择和志愿结社

[澳] 柯文·M. 布朗 苏珊·珂尼 布雷恩·特纳 约翰·K. 普林斯 著

王小章 范晓光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利的措辞：不确定性、选择和志愿结社/(澳) 布朗等著；
王小章，范晓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

(西方社会建设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Rhetorics of Welfare: Uncertainty, Choice and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SBN 978 - 7 - 308 - 07290 - 8

I. 福… II. ①布…②王…③范… III. 社会福利 -
研究 IV. C9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3357 号

福利的措辞：不确定性、选择和志愿结社

[澳] 柯文·M. 布朗 苏珊·珂尼

布雷恩·特纳 约翰·K. 普林斯 著

王小章 范晓光 译

策 划 曾建林

责任编辑 赵 琼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41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7290 - 8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总 序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更明确提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六大任务。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因此，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伟大实践，我们的社会建设无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但与此同时，同样无疑地，也应该借鉴吸收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成就与实践经验。这是因为：第一，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积累了丰厚的物质文明基础，其社会在经历了多次的激烈振荡和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也基本上趋于平稳；与此相应，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围绕着社会团结、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等公众议题也建构起了丰富多彩、视角多元的各种与社会建设密切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这些知识成果作为精神文明的积累和象征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第二，我们的社会建设无疑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要坚持中国特色；如今，我们已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社会建设所要应对的问题和风险，还是社会建设所可资利用的资源，乃至社会建设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全球互通性，就此而言，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些与社会建设密切相关的理论与经验成果，特别是在当代新的语境中所产生的那些成果，对我们的社会建设实践而言，比以往具有更加直接的可借鉴性。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决定翻译出版这套译丛。

在选择译丛的书目时，我们有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主要选取近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

其次，注重那些与当前我们社会建设实践的具体任务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

再次，注重那些关注社会自我建设、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与生长的成果。

愿此译丛能有益于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研究。

是为序。

周晓虹 王小章

2009年6月30日

致 谢

本书源自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所资助的一个研究项目。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建议。我们要特别感谢以下诸位：温迪·泰勒 (Wendy Taylor) 和劳伦·胡卫 (Lauren Howe)，他们不厌其烦地为这个研究项目提供了各种支持、建议和配合；玛利亚·安娜斯塔西亚笛丝 (Maria Anastasiadis)，在构建数据库的过程中，她给予了许多帮助；林达·布克 (Linda Burke)，在焦点小组的安排组织中，她让我们见识了她杰出的组织才干。

我们也要感谢那些参与焦点小组和配合我们调查的人们，没有他们的参与，本研究的许多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目 录

上篇 迈向一种参与性公民权理论 / 1

第一章 争议中的措辞 / 3

第二章 公民社会与公民权 / 26

第三章 志愿结社的概念 / 51

中篇 志愿结社分析 / 69

第四章 设定边界：业已确立的运作架构 / 71

第五章 被搅动的志愿部门：浮现中的市场型架构 / 97

第六章 志愿结社研究诸取向 / 119

第七章 澳大利亚的福利与志愿部门 / 134

下篇 积极公民权的求索 / 185

第八章 激活公共领域和社会资本 / 187

第九章 面对不确定性 / 200

参考文献 / 215

索引 / 232

译后记 / 251

| 上 篇 |

迈向一种参与性公民权理论

第一章 争议中的措辞

导论：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

3

本研究要在一种有关积极公民权 (active citizenship) 之可能性的论辩语境中, 来考察现代民主制下福利制度的问题与争议。激发我们去研究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借助于志愿结社这个媒介, 积极公民权能否经受住福利供给市场化的考验而继续存在? 通过对志愿结社提供福利服务的经验研究, 我们考察了在当代社会中强化社会公民权 (social citizenship) 的可能性。志愿结社是第三部门——即既非私人经济的组成部分, 也非政府部门——的基本要素。鉴于在一种后凯恩斯主义的政治环境下, 政府有关福利供给的政策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认为, 志愿结社、国家和经济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已变得更加复杂和富有争议。也正因为这些关系是不确定的、可争议的, 因而就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社会措辞, 每一种措辞都试图描述、论证、推动一种不同的福利安排方式。我们的研究要探讨各种不同类型的福利措辞, 以便更精确地理解在一种撤除了管制的、放任的经济环境下, 福利和社会公民权的可能性。更具体地说, 我们要通过对澳大利亚的一个全国性调查, 勾勒出志愿结社对于当代澳大利亚之福利供给和积极公民权的发展的贡献, 不过, 我们相信, 我们的发现对于理解第三部门的政治重要性会有普遍的意义。我们试图要提出的, 是一种关于这些关系的一般理论, 这种理论既与政治理论有关, 也与社会学关系密切。

本研究所涉及的许多概念和理论本身是有争议的。在这导论性 4

4 的第一章中，我们将努力来澄清一些核心概念问题。有关志愿结社、社会公民权和结社民主的更细致分析，将在接下来几章中展开。在此，作为整个讨论的开始，则要为我们的研究确立一些主要参数，并将我们的分析置于某些更具一般性的社会学关怀之下。比如，在第三章，我们将专门讨论“志愿结社”（voluntary association）这个概念。尽管这个概念正在迅速地成为读者所熟悉的日常语言的组成部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加以仔细检视，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同时，它也是一个可争议的概念，这部分是因为，尽管志愿主义（voluntarism）这个概念在以前通常被用来意指那些由个人对于贫困者的责任意识所激发的、一般是在业余空闲时间开展的活动，但如今，“志愿的”（voluntary）这个形容词已不一定是指那些自由的、非职业性的、利他的、无报酬的或偶然的活动。我们的研究所发现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志愿结社如今在取向上正在变得日益专业化，并且越来越依靠那些取薪的全职人员来管理。因此，我们认为，19世纪的许多有关慈善事业、慈善组织的观念对于理解今天的这些结社而言正变得越来越不相干，两者之间已没有多少可比性（尽管有关慈善的其他一些观念在今日的意义系统中还能找到其位置，就像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讨论的那样），今天的这些结社正日益成为发达社会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我们还认为，志愿结社是政治理论家们所谓的“公民社会”的一个本质性部分，并且，这种存在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中介团体”是民主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要素。在本书中，我们以“志愿福利部门”这一词汇，来指称那些以福利为主要关怀的、非政府、非营利（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志愿结社”）。就组织的成员身份和（或）对组织的贡献而言，这些组织是志愿性的，但是，取酬的和不取酬的（志愿者的）工作的某种混合却常常是它们的一个鲜明特征。事实上，有些志愿结社甚至完全是由取酬的工作人员所组成的（对这些界定的进一步讨论，见本书第三章和第六章）。

与此相似，“措辞”（rhetoric）也是一个不无问题的词汇。在通常的用法中，这一术语往往让人想到那种虚文藻饰、有意误导的言说或论辩方式。例如，从一种批判的立场看，广告就是这样一种措辞伎俩，其目的就是诱使我们去想望某种我们事实上并不需要的商

福利的措辞

品。不过,在本研究中,所谓“措辞”,乃是指任何一种使某种特定的观点得以条理化和得以提出的公共辩论或话语。因此,对我们来说,作为一种提倡宣传价值观念、立场观点的论辩方式,“措辞”具有更为中性的意味。而之所以会存在多种福利的措辞,是因为,在当代各种社会中,设立、管理、分配福利的方式非只一种。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行政来看,究竟什么才是恰当的社会福利政策,都是不清楚的、模糊的、可争议的。战后那种混合了政府计划、集中供给、直接课税、强制退休同时保证养老金等各种做法的福利制度,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终止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撤除了管制,退休政策已变得更有弹性,政府已很少完全承诺充分就业。后凯恩斯主义战略所造成的后果是彻底的不确定性,甚至连描述这种新情状的术语也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中。人们很难确定,究竟什么词汇才能最好地表达出福利去管制化(deregulation of welfare)和福利市场化的根本特征,是“经济理性主义”、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撒切尔主义,还是后福特主义?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很多作者认为,要在福利部门确立真正的市场是不可能的,我们至多只能期待建立起一个“准市场”(Flynn, 1997)。众所周知,要想把健康当成一宗商品存在诸多困难。在福利的语境中,很难作出关于消费者主权的假设:如果没有第三方的介入干预,身罹疾病的当事人就很难有效地行使他的应享权利。在人类身体的市场化方面,存在着诸多法律的、道德的难题。欧盟已经立法取缔买卖人体器官的市场,针对试管婴儿的卵子买卖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市场常常与研究治疗的生物伦理学规范相抵触,因为后者构成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一种专业关系。此外,尽管顾客可以凭以往的经验为自己选择服务,比如,试过几次以后就能知道哪位是能让自己满意的理发师,但是,像心内直视外科手术这样的健康服务往往是一次性的“买卖”。由于病人无法比较不同的外科医生对其进行心脏手术的成功率,因而他们也就很难在手术之前理性地选择自己外科医生。从顾客的角度看,不同福利制度的比较同样也困难多多,因为,(制度的)长期的效应只有通过跨代的对照组之间的对照比较才能加以有效地判断。着眼于长远,从一种

6 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天我们能够某种程度上比较肯定地说的也许只是，我们都将死去。既然这些经济的、政治的问题如此有争议，如此不确定，也就自然会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措辞反应，来表达、倡导、鼓吹各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和策略。

6 由于我们相信这些争论文辩都是真诚的，而非只是流俗的人云亦云，同时，我们亦相信，这些争议所涉及的那些潜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没有简洁明了的经济解决方式，因此，我们才采用“措辞”这一术语，而没有采用“意识形态”。在过去，“意识形态”这一词汇通常被用来意指福利承诺的虚幻性质 (Clarke et al., 1987)。但在今天的情形下，把“管理主义”说成是一种削减福利的意识形态是欠妥的，当然，这部分也是因为它还不够成熟。如果“管理主义”仅仅意味着实践中的“问责制”(accountability)，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这种管理策略。但我们目前还不能作出这样一种明确的判断。此外，我们还承认，福利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对这些困难，管理主义的某些方式是可能的解决途径——都是些真正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下面这一系列的变化，如人口的老龄化，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不断提升的服务期待，福利官僚机构的膨胀，作为关怀的一个主要来源的社群的销蚀，由于家庭转型而导致的老年人的孤立，家庭和亲属义务的瓦解，工作的衰退，以及随着技术的革新而来的医疗费用的不断上升，等等。管理主义也许真的会成为一种导致大量人口贫困化的削减福利的意识形态，但是，作出这种判断应该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而不应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预设。先入为主地认定新自由主义之前的福利体制在交付方式和当事人的满意度方面是最成功的，只不过是怀旧病的作祟。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让我们觉得用“措辞”比用“意识形态”更贴切。在不确定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当代有关福利的社会和经济情况瞬息万变，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也前景莫测。由此，一些解决福利的方式也就往往是一些临时的、应急性的方式。“风险社会”(Beck, 1992)这个概念为现代社会增添了一个重要的词汇，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缺乏控制的全球体系所具有的诸多不确定性。它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政府如今都不得不要应对的，是深深受制于缺乏控制的全球经济压力的社会，而由此带来的一个结

果，就是政策环境的高度变异性、偶然性。风险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越来越复杂。无论是法人社团还是政府，都无法轻易地控制这些迅捷的全球变化，或对这些变化作出有效的反应。而随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专家的意见也相应变得更加分化，更加不确定。一些社会学家已经指出，现代性作为一种后果已变得更具自反性 (reflexive)，更富争议性 (Giddens, 1990)。

无论你是否在政府内，还是在企业中，我们都毫无例外地置身于一个被不断重构的世界中，这是全球变迁和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的一个结果。组织结构总是临时性的，中间管理总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考验中，组织与业务的兼并是商务部门的常态。传统上，大学通常可以避开诸如此类的压力，但如今也在一种准市场式的状况下运作。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大学的使命被不断地重估和改写。在此，组织的流变不居 (fluidity) 可以看做是对日益上升的社会复杂性的一种反应。制度不能不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愈演愈烈，随着社会问题之规模和复杂性的日益上升，随着眼前这个电子信息社会中不断涌现的技术创新所带来的迅捷社会变迁，而不断地改变。

与这些变化相伴生、相交织的，是管理上对于控制、问责制和透明度的要求。与风险社会相伴随的，是一个“审计社会” (Power, 1998)。组织的变迁和不稳定性已经引发了一系列力图通过审计手段和会计机制 (对这些变迁和不稳定性) 加以调控的抵消性力量。去管制化 (这导致了高风险的环境) 和管制化 (这带来了麦当劳化、审计决算和质量控制制度) 之间的紧张冲突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象。而这些相互矛盾冲突的压力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混杂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在趋向社会失范的同时，也导向权威控制 (Turner, 1999)。福利体制无疑也处在同样的压力之下，因而也就显示出同样的组织上的不适：不断的重构，不断的重新计划，伴随着无休无止的管理检查、质量审计、顾客满意度评估，等等。组织始终处在疲于奔命之中，由此造成了一种导致管理上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情境，在这种情境下，组织的领导者常常无暇仔细思索，不论当下流行的管理理论所推销的是什么处方，他都倾向于去采纳：从新泰勒主义、后现代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到准时制管理 (just-in-time management)、公共关系理论，等等。可以说，

正是不适，催生了纷纷献计献策、建言各种适应性反应的不同“措辞”。因此，我们认为，措辞乃是彼此竞争、互不通约的各种专家知识体系的一个函数；措辞之所以层出不穷，是因为专家知识体系之间的这种纷争不像议会辩论那样有一个终止辩论的表决程序。最后，至于为什么我们使用“措辞”而不采用“后现代”来讨论现代福利体制的不确定性，部分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后者已经被用滥用乱了（Leonard, 1997）。

假如我们仅仅认为，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描述各种不同的政策选择，罗列各种不同的措辞反应，那固然简单，但却毫无意义。但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确实想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立场，这种立场源自我们对积极公民权的信念与承诺。在本章的结论部分，我们将探讨一系列福利方案，我们将努力按照从一种特殊的、由当代公民权观念所界定的价值立场所得出的政策标准，来评价这些方案。为了提出这种观点，我们先要来思考讨论一种有关公民权之政治理论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将构成本研究的潜在结构。

一种公民权和政治制度的类型学

为了给我们对澳大利亚第三部门福利的研究分析提供一个框架，我们提出了一种描述四种政治制度的类型学。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可以将社会理论理解为是围绕四个基本概念组织起来的，并且也是以这四个基本概念来表述的，这四个概念就是，国家、市场、个体与社群（community），它们经常处于两相对分的关系中。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概念看做所有社会理论的主要建筑材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将或明确或含蓄地对这四种要素之间之经验性和规范性的关系表达出自己的观点立场。例如，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个体被放在优先于国家或社群的位置。与此相对，社群主义则努力想恢复这些概念之间的平衡，并特别指出，某些版本的个人主义（如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是敌视公共义务的。而类似地，我们也可以来设想这样一些市场关系的形式（versions of market relations），一方面给资源分配的选择和弹性留下余地，另一方面则没有

伴随以利润原则 (without a concomitant basis in profit)。在任何一种谋求“使社会民主制民主化”的方案中，这样一些“公民的”或者说社会性的市场机制，都必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例见：Walzer, 1992）。

在导论中，我们要考察这些要素的四种结合，即：个体与社群、个体与市场、社群与国家、市场与社群。我们相信，对于这一概念领域的探讨，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框架，同时也将提供出一种针对各种福利措辞的规范性立场。

法西斯主义：个体与国家

一些社会理论通常认为，对于理解社会来说，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根本性的。而只要个体在道德上被认为对于社会秩序是一种腐蚀性的、脆弱的或危险的因素，国家就必然相应的被看做是文明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力量。国家的功能就是表达民族 (nation) 的价值，促进民族的文化，并使个体服从这一政治目标。这种理论有许多版本。但在此，我们仅论及路德神学留给德国政治理论的遗产。9
经过农民战争 (Engels, 1956) 以后，作为路德一系列论文之直接产物的德国清教教会发现，对于《圣经》之权威的那种完全不受控制和约束的解释导致了无穷无尽的派系分裂和冲突。于是，逐步地，关于政治权力，无论是路德宗的教义还是加尔文宗的教义，都开始把国家看做是一个必要的机构，一个为了公共利益而必须在对个人的道德控制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机构。我们可以将这一结果看做是霍布斯秩序难题的一种表现形式。人是理性的（但并不一定是道德的），他们会相互争执，从而导致社会的（宗教的）分裂。而国家就是作为公共争论的最终也是理性的仲裁者而创建的。在德国唯心主义那里，这种观点常常以一种悖论的形式指出：人是自由的，唯当其行动合乎国家及其法律的意旨时。行动的自由只有当其与国家的法律相一致时，才能最大化。

这种观点事实上意味着，对于国家，不可能存在正当的反抗，因此，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权威主义。从公民权的理论来看，这种观点的一种极端形式，也许可以称之为“有机的法西斯主义” (organic fascism)，在其中，个体的身份认同完全被对国家的认同所湮没。个

10 体只有在对国家的无私奉献中，如通过对领袖的效忠，才能找到其真实的身份。领袖民主制的概念是这种观点一种表达，而希特勒的克里斯玛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则是这种观点的一个活生生的体现。由于国家不能被质疑，因此就难以从宪法上来说明纳粹国家是一种不正当、不合法的政治制度（Krieger, 1957）。在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理论中（Turner, 1989），我们从他关于公民投票式民主（plebiscitary democracy）的观念中可以找到这种观点的一种弱化了的表现形式。受罗伯特·米歇尔斯关于大众政治的批判理论的影响，韦伯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认为草根民主并非现代国家的一种有效的政治解决方式。同时，在目睹了一战的灾难性结果之后，韦伯也清楚地意识到了德国政治领导上的失败。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韦伯逐步走向了这样一种结论，即，民主仅仅只是一种选举产生具有某种程度的公众合法性的政治领袖的机制。但是，一旦就任
10 履职，一个有效能的领袖就不应再受选民的掣肘，无须再与选民磋商。通过普鲁士化进程而创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俾斯麦，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这种传统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后果。首先，公民投票式民主所指示的是一种被动而不是积极的公民权，实际上，它意味着，对于个体来说，其道德行动的恰当场所只在家政领域，尤其是在家庭内部。个体公民被定期地召去投票选举领导人，但是一旦这一任务完成，公民就须退隐到私人领域，在家庭之内去履行其作为家长的责任。私人领域是道德训练的场所，而国家则要监管公共领域。在激进的路德主义观念中，由于个体在本体论上被认为是邪恶的，因此，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机构（如教会、国家、家庭），来训练、管束因犯下原罪而被逐出伊甸园、不得不靠劳动来谋生的“人”。为了对人进行管制、约束，国家和家庭是必须的恶。家庭要调节人的性行为，只有当为了生殖之目的时，才可不得已而为之。国家则要为了公共的安全而控制人类的暴力潜能。

这种理论的第二个后果，是不承认志愿结社的重要性或合法性。介于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中介团体削弱领袖那种独揽的权威。因此，唯一可能获得承认的中介机构只剩下表达领袖意志的政党。在纳粹德国，无论是教会组织、劳工组织，还是社区组织，都受到